

# 《无问西东》背后的联大先生们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《无问西东》正在全国热映，好评如潮。电影截取了四段故事，其中一段发生在西南联大时期，青年学子或徒步穿行于湘黔滇，或在简陋的教室静坐听雨，或于炮火中辗转昆明郊外——即使山河破碎，烽火遍野，文脉依然不绝，薪火仍旧相传。

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在这些学子身后，有一群风骨、气节和学问并存的大师身影。梅贻琦、陈寅恪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钱穆、吴宓、刘文典、金岳霖、冯友兰、沈从文，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，每一个名字都是教科书上的常客。正是这些大师的道德学问，成就了西南联大。



联大常委、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。



联大时期的闻一多先生。



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的先生们。

## 湘黔滇旅行团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北大、清华和南开三校南迁，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。不久战火南延，临时大学分三路再迁昆明，其中两路乘车乘船赴滇，第三路则从长沙经益阳、常德、桃园、芷江、贵阳、安顺、镇宁等地，徒步穿越湘黔滇抵达昆明，这支队伍就是抗战初期有名的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。

旅行团共有学生244人，国民政府军委会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；另有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，闻一多、黄钰生、曾昭掄、李继侗和袁复礼等5名教授组成指导委员会，由黄钰生担任主席，后来黄钰生和袁复礼因个人原因退出了旅行团。

1938年2月19日，旅行团举行开拔仪式，第二天正式出发。一艘小火轮拖着两条大木船，载着全体人员从湘江直下洞庭。抵达益阳附近时，旅行团师生登岸开始步行。

湘黔滇旅行团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走出校门与社会接触，师生对西南一带的民风民俗及人文历史了解甚少，学校便将从北平带出的许多关于西南地区的图书资料拆箱，让有兴趣的老师和学生普及这方面的知识。旅行途中或宿营休息时，辅导团的教授便结合当地山川地理、风土人情进行现场教学，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民歌、研究地方方言；李继侗介绍云南乡村的情况；袁复礼则在湘黔一带讲述河流、地貌的构造和演变。同学们边走边学，兴趣盎然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既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无法学到的新知识，又领略了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真正内涵。

3月25日，旅行团到达贵州炉山（今凯里），访问苗寨。第二天举行汉苗联欢会，苗族群众吹芦笙跳舞欢迎，同学们唱歌道谢，李继侗教授舞兴大发，和旅行团医官徐行敏跳了一曲华尔兹；团长黄师岳也舞了一回手杖助兴；曾昭掄教授则和苗族群众斗酒，大醉而归。

到学校后，据好事同学总结，曾昭掄先生走路一丝不苟，途中每遇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形，被评为全团走路最多的团员。而闻一多、李继侗经过几个月风餐露宿，胡子已经留得很长，二人约定抗战胜利后再剃掉，但李继侗“晚节”不保，到昆明不久就剃掉了。

闻一多是个浪漫的诗人，当时虽然还不到40岁，但面容老相，所以出发时大家都劝他坐车去昆明。闻一多的好友杨振声开玩笑说：“一多加入旅行团，应该带一具棺材走。”但闻一多一路饱览奇绝的山水风光，非常兴奋，身体也比原来好多了，还拾起了荒废多年的画笔，一连画了几十张素描。其间，闻一多在致妻子的家书中说：“现在是满面红光，能吃能睡，走起路来，举步如飞。”到昆明后，精神焕发的闻一多见到杨振声就说：“假使这次真带了棺材，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。”说完两人抚掌大笑。

## 跑警报

西南联大到昆明的头几年，日本飞机经常来骚扰，空袭频繁。就像电影里的场景那样，师生们听到空袭警报就躲到郊外去，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，这在当时叫跑警报。当然，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，据中文系的汪曾祺回忆，有一位广东同学，一有警报，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，警报解除了，他的莲子也烂了。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，这位同学听着炸弹在不远处爆炸，照旧神色淡定地煮他的冰糖莲子——后来这个细节被电影《无问西东》采用，用到了沈光耀身上。

空袭警报响起后，师生们大都躲进郊外的山沟里，那里相对安全些。学生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，十几分钟就能翻过几个山头；先生们就不行了，一是年龄较大，再说常年在书斋里静坐，翻山越岭非其所长。联大常委、清华校长梅贻琦即使跑警报也穿戴得整整齐齐，手里拿一把张

自由，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学生的需要编写教材和讲义，他们讲课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，非常有趣。曾在联大就读的历史学家何宗武在《上学记》中写道：“比如中国通史，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，听课的人多，钱穆、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，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，内容也大不相同。”

闻一多先生讲授中国古代神话非常“叫座”，不只是文学院的学生来听，就连工学院、理学院的同学都来抢座。闻一多讲课图文并茂，他会绘画，常用毛边纸画出伏羲、女娲等各路神仙，钉在黑板上，口讲指画，有声有色，引人入胜。闻先生讲课还有一个特点，上课时先点上烟斗，同学们也相继拿出香烟，互相让烟，课堂上下烟雾缭绕，其乐融融，一派神仙景象。

金岳霖是教逻辑学的，人们都叫他老金。逻辑学是大一新生的必修课，学生很多，上课在大教室。金先生有时要提问，但那么多的学生不可能都叫上名字，所以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：“今天，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。”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有点紧张，也有点兴奋。

金先生开了一门“符号逻辑学”的选修课，晦涩难懂，教室里学生不多，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叫王浩的同学，经常向金先生请教。金先生讲着课，有时也会突然停下来问：“王浩，你以为如何？”王浩也不客气，站起来讲一通，其他学生插不上话，整堂课几乎成了师生二人的专场。

金岳霖喜欢读通俗小说，他和沈从文私交很好。有一次沈从文拉他去给学生讲一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，大家都很期待，以为金先生一定会有高论。不料金岳霖讲了半天，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任何关系，让沈从文和同学们大失所望。

陈寅恪在联大讲隋唐史和魏晋南北朝史，陈先生名气大，是清华四大导师之一，所以很多同学趴在窗子外面听他讲课。陈先生上课时夹着一个布包袱，里面包着书，但他基本不看，开口就是哪本书中的哪一段，原话是什么。陈寅恪讲的东西太专业，引用的资料同学们也都没见过，所以基础差的一般听不懂。陈先生在联大待的时间不长，后来去欧洲治病，恰逢欧战爆发，便滞留在了香港。

而陈寅恪密友吴宓教授讲课又是另一番景象，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，又是红学专家，经常为同学们开《红楼梦》讲座。吴宓留学出身，非常绅士，对女士特别尊重，开讲座时看到有女生站着，就马上出门，去别的教室搬椅子，直到所有女生都坐下才开讲。听过吴宓讲课的汪曾祺回忆说：“吴先生讲课内容如何，不得而知。但是他的行动，很能体现‘贾宝玉精神’。”

## 课堂上的教授

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非常